



◀隆福寺藻井



从通风采光到祈福避火

藻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穴居顶上的通风采光口——古人称之为“中溜”。先民们在穴居顶部留一个洞口用来采光通风,后来这个洞口逐渐被装饰化,成为室内顶棚上最引人注目的部分。最早的书面记载见于汉代张衡的《西京赋》:“蒂倒茄与藻井,披红葩之狎猎。”“茄”指的是莲花,说明汉代藻井上已经有倒垂的莲花装饰。

“藻井”二字的含义,在《风俗通》中有明确记载:“今殿作天井。井者,东井之象也;藻,水中之物,皆取以压火灾也。”中国古建筑多为木结构,防火是头等大事。古人相信金、火、水、木、土相生相克——水克火,而井中有水。给天花板取名“藻井”,正是希望借助水的意象来镇压火灾。此外,藻井也被视为二十八宿中“东井”的象征,古人称之为“覆海”。

藻井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:汉代至魏晋南北朝为初始期,隋唐为发展期,宋元为定型期,明清为繁荣期。从实用的通风采光口,到带有避火寓意的装饰构件,再到象征天穹的华美藻井,它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、由实用到装饰的完整过程。

上圆下方的造型与“天圆地方”吻合

现存最早的木构藻井,在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上层,建于辽统和二(984年),为方形抹去四角、上加斗八的结构。所谓“斗八”,是由八根角梁组成的八棱锥顶。这是宋代藻井的典型形式。

宋代李诫编修的《营造法式》中,将天花装修分为三类:平闇、平棊和藻井。平闇是用方木格整齐排列成小方格网架,上盖木板。平棊是大的方木格网上置板、画彩画。而藻井则专指天花向上凸起为穹窿状的结构,施用场所有严格限定。

到了明清时期,藻井的装饰更加复杂细致,由图案装饰为主转向雕饰,装饰主题多为龙凤。清代甚至将藻井改称为“龙井”。故宫太和殿的藻井是清代藻井的典型代表——在八角井上设一圆井,当中雕一条突起的蟠龙,垂首衔珠,称为龙井,是清代建筑中最华贵的藻井。

藻井的结构形式有多种:方形、矩形、圆形、六角、八角、斗四、斗八、螺旋等。无论哪种结构,多数藻井基本形成了上圆下方的造型,正好与“天圆地方”的宇宙观吻合。

太和殿藻井 皇权象征 蟠龙衔镜

太和殿的藻井位于大殿正中央,分上、中、下三层:下层为方井,井口直径将近6米;中层为八角井;上层为圆井。三层通高将近1.8米。藻井内雕有一条俯首下视的金龙,口衔轩辕镜。轩辕镜传说由黄帝创制,代表了皇帝的正统地位。在太和殿、交泰殿、养心殿等处的藻井上,龙口衔有宝珠,被称为轩辕镜。太和殿的轩辕镜一共有一大六小,彰显出最高级别宫殿的气派。

关于轩辕镜,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:1644年李自成攻陷京师后,之所以不敢在太和殿登基,正是因为害怕自己这个“来路不正”的天子会导致轩辕镜坠落。这个故事的真假已不可考,但它说明了一个事实——在古人心目中,藻井不只是装饰,它是有象征意义的。

戒台寺藻井 斗八穹顶 九龙护坛

北京戒台寺的戒坛殿内,有一处精彩的斗八藻井。藻井分为上下两部分,上部为圆形的穹窿式,正中倒挂着一木雕团龙,龙头居于藻井中心,俯视下方;团龙四周的穹壁上还雕有八条“升龙”,合为“九龙护顶”。下部为方

藻井：悬于殿内的微型天穹

形井口,四周雕有许多小天窗,天阁上配有众多小佛龛,内有精雕的饰金木质佛像。藻井由辽代旧构件与明代重修工艺结合而成,中央为辽代木雕的倒挂团龙,四周八条升龙全部贴金。

“九龙护顶”的布局在现存古建筑中极为罕见。九条龙环绕穹顶,中心团龙俯视戒坛上的佛像,既有宗教的庄严,又有皇家的气派。

隆福寺藻井 天宫星图 镇馆瑰宝

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明间藻井,被誉为“中国最美藻井”。它建于明景泰三年(1452年),距今已近600年。藻井直径约两米,上下共有6层,主体为木质结构。每一层都有精致的云纹装饰,其中有4层雕刻出重重宫阙——楼阁、连廊、小殿共68座,仙人、天女站立其中,神态各异。阁楼的造型有歇山顶、攒尖顶等不同形式,四个角分别矗立着四大天王,单手擎天。整座藻井皆由榫卯拼接而成,不用一颗钉子。藻井顶部正中是一幅古代星象图,在深蓝色底上绘有1400多颗金星星宿,以沥粉贴金的手法绘制,星与星之间用金线相连。据考证,这幅星图对应的是850年前后的星空。四周彩绘二十八星宿图,与顶部星宿图遥相呼应。

1976年唐山大地震,隆福寺严重损毁,藻井被拆成散件。1989年被移送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(先农坛)太岁殿收藏。由于经历多次拆散和迁移,藻井已支离破碎,部分构件失落。文物专家根据梁思成等人主持的营造学社留下的老照片,对照实物一点一点拼接,历经5年修复,基本恢复了原貌。如今它已成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。

站在它下面抬头看,六层天宫楼阁层层叠叠,1400颗金星铺满穹顶——你会发现,古人说的“天圆地方”,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,而是一个可以被看见、被触摸的空间。下次去参观古建筑,记得抬头看看。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天花板,可能是整座建筑里最花心思的地方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



◀戒台寺藻井



▲太和殿藻井

中国糖纸：方寸之间的巧思

红蓝白三色,端坐正中的白兔——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一张大白兔奶糖糖纸,被网友称为“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”。抛开属于国人的“滤镜”,这张糖纸本身的设计也确实经得起推敲,图案、色彩、版式皆有巧思,方寸之间自见匠心,沉淀着中式审美的意趣。

糖纸,即糖果的包装用纸,在收藏者那里,它还有一个名字,叫“糖标”。清末民初,随着城市开埠和国外糖果厂的进入,作为“装璜”之物的糖纸也受到关注。糖果久负盛名的“南沪、北津”在20世纪初期不约而同地看到了包装与销路之间的关系。天津老茂生的糖果不仅“甘香爽口”,还“彩色装璜,亦极精美”,既讲求口味,也重视包装,产品远销各地,“平津及各省商埠,均设分公司”(《香河县志·卷三》)。1929年,在上海冠生园刊登的广告里,新式糖果的“味美质良”“固无论矣”,在此基础上还“装璜精美,携带便利”,适宜“送礼款(款)客”(《西湖博览会日刊》)。

20世纪中期,中国糖纸设计的本土意识日渐鲜明。在图案上,既有神话中的嫦娥奔月、敦煌飞天,也有吉祥寓意的龙凤呈祥、喜鹊报春,还有拖拉机、大吊车、高压电线等呈现生产建设、反映时代特点的元素。大白兔糖纸的设计即体现了这一过程,其前身“ABC米老鼠糖”直接借用了美国卡通形象,1956年重新设计时,美工组多次商讨,“公司形象最终选用中国传统神话中具有长寿、祥瑞、营养、温顺的‘兔’为理想图式”。兔子既能使人联想到神话中长生不老的“玉兔”,也是生活中儿童熟悉、喜爱的动物,上海天明糖果厂的滑冰奶糖也同样使用了兔子这一文化符号。神话、民俗、童趣交织,体现了中国糖纸设计上独有的叙事语言。

在色彩上,早期糖纸受印刷技术所限多为单色印刷,且以红色为主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,红色既象征正统,也有喜庆、高贵、吉祥的多重意涵。随着技术的发展,糖纸色彩逐渐丰富,红、蓝、黄、绿、黑、白等颜色被广泛运用,与《礼记·玉藻》所记载的“正谓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,五方正色也”颇有呼应。大白兔糖纸以红、蓝、白为主色,其中红色居于画面中心,占据主视觉区,奠定了主体的基调,蓝白色用于两侧的连续纹样,在冷暖对比中调和了红色的浓烈,也使设计形成了近似于青花瓷清雅明净的风格。

扭结式是糖果包装的主要形式,用柔性包装材料将糖果裹成圆筒形,将开口的端部做旋转扭结,不需要粘结即可裹包封装。这种形制多使用“川字形”(三段式)排版,即中间为主体图案区,两侧为连续、对称的纹样。对称不仅是建筑上的技法,也是中国传统“中正有序”的具象化表达,梁思成曾说,“无论东方、西方,再没有一个民族对中轴对称线如此钟爱与恪守”。大白兔奶糖的糖纸是典型的此类排版,视觉中心是辨识度极高、与奶糖同名的大白兔形象,两侧则是连续延展的兔子纹样,重复、对称的方式承袭了传统二方连续的制式。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熊猫球糖



部分奶糖糖纸。

也是类似的设计,中心为大熊猫,两侧是连续的竹子,繁简相宜,画面活泼而不失秩序。

糖纸勾勒出的是中国设计发展的一个侧影,图案、色彩、版式共同构成了一种日常而具体的中国叙事,沉淀着文化与情感。语言学家钱乃荣回忆,对自己“艺术头脑的开发发生最大影响的”,不是每周一次的图画课,而是“糖纸头”和“花绢头”。吃过糖果后留下的包装纸要把它们拉平、压平,或者放进清水里漂洗后贴到玻璃窗上吹干,这样糖纸就“像没有包过糖似的”(《糖纸头:海派文化的童年情结》)。作家梁晓声回忆,在哈尔滨,区别于无包装的“杂拌糖”,有糖纸的是“礼糖”,“礼糖”是“高级块糖”,如果糖纸上印着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的某某糖厂的厂址及厂标,那更是属于“珍品”,如把自己珍贵的糖纸赠送给同好,也能成为“友谊笃焉”的证明。

小小糖纸,凝结着国人的审美体验与集体记忆,从中亦可窥见中国近现代轻工工业的发展历程。方寸之间的糖纸,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被重新看见。

(据《光明日报》)

明代紫檀香盒

此香盒直径7.8cm,盒身以名贵紫檀为料制成。盒面采用百宝嵌工艺,以珊瑚、螺钿、绿松石、白玉等镶嵌梅花、牡丹纹样,并以错银丝镌刻篆书诗句“老干含春意,疏枝吐玉花。酒阑明月上,移影卧窗纱。”

据介绍,香盒为古代贮存沉香的文房器物,形制多精巧雅致。此盒镶工精妙绝伦,出自明代镶嵌名家周柱之手。

(据《侨乡科技报》)

清代黄地洋彩碗

此碗直径15.2cm,敞口深腹,内施白釉,碗心以红彩绘5只蝙蝠,寓意“五福”。外壁敷施淡黄彩为地,装饰彩绘缠枝莲花纹及百合花卉纹。

据介绍,此碗为清乾隆年间定制承烧的官窑瓷器,碗型精巧秀美,构图繁而不乱,寓意吉祥如意。

(据《侨乡科技报》)



唐代鎏金石榴花纹银盒

唐代李商隐有《石榴》诗云:“榴枝婀娜榴实繁,榴膜轻明榴子鲜。可羡瑶池碧桃树,碧桃红颊一千年。”这首诗以丰富的想象、新巧的比喻和精美的语言,描写了石榴的美丽可爱。石榴有着多福、美满、团结等诸多美好寓意,作为一种装饰元素广泛应用于各类服饰、器物之上。石榴来自遥远的西域,丰富了中国古代人们的味蕾,在古代饮食文化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。

出土于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、由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鎏金石榴花纹银盒,无疑是石榴花主题的精美文物。这件银盒高6.6厘米,口径12.8厘米,造型为平面圆形,顶和底均微隆起,子母口扣合,子母口与盒身捶揲而成,花纹平鑿,纹饰鎏金。盒盖、盒底主纹相同,均为三重:中心为八出团花一朵;第二重为八枚忍冬石榴花结;第三重为六株柿状花结构成的团花八朵,团花心均有衔草翱翔的鸿雁一只。盖沿与盖侧以四枚石榴花结组成菱形四出团花八朵;上下口沿以六枚石榴花结组成团花八

朵。盖内墨书“溪州并砂卅七两,十两,兼盛黄粉”。鉴赏这件银盒纹饰,颀划流畅,一气呵成,表现了唐代高超的工艺,并将石榴花与本土花色有机组合,是我国同中亚文化交流的产物,是研究中外文化重要的史学资料。

(据《联谊报》)

